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年10月23-25日)

1、ECFR：“新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

10月19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官网刊发其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这次的新冷战有所不同》。文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近期与日韩领导人讨论如何遏制中国和对抗俄罗斯的影响；与此同时，金砖五国领导人齐聚约翰内斯堡，批评西方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中的主导地位。这足以让冷战史学家感到似曾相识。1945年-1991年，国际秩序的两股决定性力量分别是意识形态冲突和对独立的追求，前者将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后者带来了国家数量的激增。虽然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但意识形态冲突占主导地位：争取独立的斗争往往演变成代理人战争，各国要么被迫选边站，要么加入不结盟运动。美国认为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将再次占主导地位，并拉拢其盟友推行“脱钩”和“去风险”。美国盟友在多方面存在利益分歧。金砖国家最近的一次扩员增加了新成员国的行动自由。这些都表明，各国都有能力追求各自的国家目标，而不是效忠于某超级大国。作者指出，比起狭隘的亲华联盟，各国不依赖西方而能更多选择自由的世界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与许多人，

尤其是美国人的看法相反，新冷战的基础可能不是两极分化的旧逻辑，而是“碎片化”的新逻辑。

<https://ecfr.eu/article/this-cold-war-is-different/>

编译：黄辉平

2、《外交政策》：欧洲的科技限制将阻碍欧洲科技产业发展

10月23日，《外交政策》官网刊登新自由主义中心联合创始人耶利米·约翰逊（Jeremiah Johnson）的文章《欧洲科技限制是一把双刃剑》。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元宇宙”新战略议程，但收获反馈较为负面。尽管如此，欧洲分析人士依旧坚持虚拟世界将领导未来的科技。因此，欧盟相对于成为新科技的引领者，更希望成为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或新技术的监管者，其所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DMA）以及《欧盟数字服务法》（DSA）都是针对互联网商务和科技公司的监管法案，被认为是各自立法领域的领先举措。欧盟也试图通过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成为第一个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实体。但是，此举被认为可能会限制自身科技的发展。相较于美国，欧洲整体缺乏成规模的数字科技产业。因此科技立法一开始针对的是美国，目前所有立法所处罚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科技巨头，如苹果、微软等以及中国的字节跳动。目前上述企业也为规避欧盟法案可能造成的巨额罚款开始纷纷逃离欧洲市场。目前，民间对DSA的颁布出现反对

声音，认为欧洲可以继续发挥其作为科技监管者的作用，但长远来看，这可能会通过模糊且独裁的危机机制来封锁内容、限制言论自由，导致投资和人才外流，并造成其科技生态的分裂。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0/23/metaverse-europe-uk-us-big-tech-regulation-innovation/>

编译：马子涵

3、ECFR：欧盟扩大的地缘政治分析

10月24日，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ECFR）网站刊登了理事会专家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欧盟扩大的地缘政治分析》。10月6日，欧盟领导人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问题。文章指出，乌克兰和西巴尔干问题已成为一个对欧盟及其全球作用都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欧盟正在走向重塑，而这种重塑是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个支柱是安全。首先欧盟需要团结起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不能仅依靠北约来满足防务需求。其次欧盟扩大的核心是明确欧盟势力范围的边界，确保乌克兰等国能够参与欧洲未来，而不是被当作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第二个支柱是经济。欧盟必须注重建立多样化伙伴关系，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从而帮助巩固欧盟的全球地位。但乌克兰加入欧盟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经济动荡可能会影响到欧盟内部尤其是东欧国

家的部分产业发展。第三个支柱是价值观。欧盟内部出现自由主义和非自由民族主义两大力量的对立。欧盟的扩大为双方都提供了潜在解决方案。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通过法治条件和特定多数投票来实施内部改革的机会，有利于减轻民族主义倾向。对非自由主义者来说，如果接纳塞尔维亚和可能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乌克兰，非自由主义集团的力量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将欧盟扩大这一深刻的生存困境简化为有关预算、程序和机构的官僚主义辩论可能会将欧盟置于危险中。欧盟必须建立一套与 2004 年引导波兰、匈牙利加入欧盟时不同的创新框架，引导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巴尔干国家成为欧盟的一员。

<https://ecfr.eu/article/the-geopolitics-of-eu-enlargement/>

编译：李佳骏

4、欧盟对外关系理事会：为更广泛的冲突做好准备

10月20日，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ECFR）刊登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和北非项目的主任朱利安·巴恩斯-戴西 (Julien Barnes-Dacey) 的文章《为更广泛的冲突做好准备：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如何升级》。文章首先指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不断升级冲突的背景下，该地区需要为更广泛冲突做好准备。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需要协调一致的外交手段，以及一定的运气。这场战争威胁着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组织，可能对塑造地区秩序的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地区参与

者希望避免冲突，因为冲突会威胁到已有利益关系。欧洲应该紧急与他们合作，开展预防性外交。文章接着提出，尽管民众骚乱日益加剧，但国际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威胁上。在那里，以色列军方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部队正在加紧“针锋相对”的交流，因为黎巴嫩集团试图保持对以色列的压力，同时展示其对哈马斯的声援。黎巴嫩跨境袭击和以色列报复事件越来越多。但这仍然按照既定和可控的游戏规则进行，任何一方都没有越过对方的红线，这表明双方都希望避免进一步升级。文章指出，巴勒斯坦问题从根本上破坏了由《亚伯拉罕协定》塑造的新兴区域秩序的想法。在冲突重新爆发的情况下，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几乎没有意义。文章最后指出，爆发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不仅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悲剧，而且也是更广泛区域的悲剧。欧洲现在需要更积极参与，也要通过欧洲与伊朗和真主党的持续沟通确保该地区避免持续分裂。

<https://ecfr.eu/article/bracing-for-a-broader-conflict-how-the-israel-hamas-war-could-escalate/>

编译：张瑞勇

5、CFR：诺博亚上任后的挑战

10月1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其拉丁美洲研究项目研究员威尔·弗里曼（Will Freeman）的文章《厄瓜多尔 2023 年大选：诺博亚的胜利意味着什么》。文章首

先对丹尼尔·诺博亚（Daniel Noboa）进行介绍。诺博亚是厄瓜多尔首富之子，拥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继承权。自诺博亚成为厄瓜多尔立法机构议员后一直保持低调，但他在电视辩论中展现的非凡能力使其在最终选举中击败了左翼对手路易莎·冈萨雷斯（Luisa González）。诺博亚上任后，将面临厄瓜多尔目前的经济困境和组织犯罪激增的挑战，尽管已经制定了诸如打击犯罪、增加社会援助等改革方案，但其在后续执政的 18 个月中对厄瓜多尔国内问题进行彻底改革仍然不太现实。文章表示诺博亚的上台并不能为厄瓜多尔带来稳定，由于近年来立法机关的权力得到强化，而冈萨雷斯领导的公民革命运动党在厄瓜多尔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诺博亚并未将冈萨雷斯视为对手，反而会倾向同公民革命运动党建立合作。但目前该党正处于反腐败的清查中，因此诺博亚不得不同占据第二多席位的厄瓜多尔运动党进行斡旋，避免在议会中失势。文章最后指出，诺博亚并不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由于美国提供的安全援助将帮助厄瓜多尔削弱犯罪组织对政府的渗透，因此本届政府的外交重心是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

<https://www.cfr.org/in-brief/ecuadors-2023-election-what-noboas-victory-means>

编译：何秉轩

6、《大西洋月刊》：内塔尼亚胡的终结

10月22日,《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亚尔·罗森伯格(Yair Rosenberg)刊登了一篇名为《内塔尼亚胡的终结》的文章。文章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向公众许诺只要他掌权,就能保障以色列人民的安全,但在经历了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反犹太暴力之后,这一承诺被打破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生涯也将迎来终结。 Hamas袭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很糟糕。在过去的两周里,以色列人民的安全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威胁,这是以色列人民无法原谅的,内塔尼亚胡也因此失去了以色列人民的信任。民意调查显示了公众的愤怒,绝大部分受访公众认为来自加沙的灾难性袭击是该国领导层的失败,内塔尼亚胡应该在当前战争结束后辞职。80%的以色列人希望内塔尼亚胡公开为10月7日的事件负责。事后看来,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早有预兆。内塔尼亚胡自己承认,他有意支持 Hamas作为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制衡,以保持巴勒斯坦公众的分裂,并阻止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此外,自去年12月重新掌权以来,内塔尼亚胡花了数月时间破坏以色列的社会团结,并向其敌人示弱。他领导的联盟试图摧毁以色列的司法机构,使该国人民相互对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国内动荡。同时他解雇了国防部长,亲自促成了一个极右翼联盟进入议会,给其无能和缺乏经验的成员提供了关键职位。总之,10月7日的灾难是内塔尼亚胡多年错误决策的必然结果。最终,这位被称为“安全先生”的人以自己的标准失败了,他没有实现同胞们的基本期望。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3/10/benjamin-netanyahu-israel-hamas-attack-failure/675722/>

编译：刘楠

7、CSIS：考察中国对“去风险”的最新评估

10月17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项目研究员莉莉·麦克尔威（Lily McElwee）的文章《中国对“去风险”的最新评估》。文章指出，目前中国政界、学界对西方“去风险”的表述态度并不乐观，认为其根本目标仍是去中国化。有学者认为，此概念由于模糊，容易被更多国家接受，带有相当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文章认为，目前西方的“去风险”政策本身并不一定能有效团结美国及其盟友并遏制中国。首先，降低对华依赖可能损害美西方国家能源转型、数字化转型等优先事项的进展。其次，由于越来越多的技术具备军民两用的特点，以国家安全为标准认定需被管控的产品和技术也愈发困难。此外，即便当前部分企业正在降低对华依赖和联系，但中国仍是诸多公司主要市场和技术合作伙伴。最后，不同利益相关方对去风险的规模和范围的判断截然不同，各国乃至国家内部的不同党派之间对去风险的具体举措和定义存在分歧，这或使去风险的步伐放慢。目前中国应对去风险政策存在三种手段：一是进一步减少对外国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二是尝试对美西方国家在关键材料出口管制等领域进行报复。三是中国仍

持续与外国企业进行接触，并对美国的盟友采取分而治之的战略。总之，西方国家需要谨慎应对中国对冲“去风险”的政策。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ijings-emerging-assessment-de-risking>

编译：雷文聪

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的行政管理者与修正主义者之争

10月20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其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塔蒂亚娜·斯塔诺瓦亚（Tatiana Stanovaya）的文章《俄罗斯的另一场战争：行政管理者与修正主义者》。文章提出，俄罗斯当权者已达成取得对乌行动成功的共识。但行政管理者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将成为精英内部冲突的根源。行政管理者掌握行政、生产和财务资源，谋求在维持国家结构现状的情况下快速达成实际目标；修正主义者具备规划视野和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外围精英长期支持深刻变革。作者认为，当今俄权力模式中唯一分歧是战术分歧：随战争拖延及代价加大，社会不稳定、军事挫折、局势升级和俄战争地位恶化都将促成修正主义者崛起并削弱行政管理者的力量。俄正处于分岔路口，即如果发生内乱且权力向行政管理者倾斜，当局对政权掌握将被削弱；而当修正主义者完全控制权力杠杆时，俄或将面临斯大林式转

变。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0814>

编译：李达镐

9、《外交学人》：巴以冲突冲击“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10月17日，《外交学人》官网发表德国弗莱堡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吕兰德（Jürgen Rüland）的评论文章《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已死亡”？》。文章认为，巴以冲突凸显中东复杂的地缘战略形势和基建安全风险，使得“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或因基建安全无法保证、参与国关系无法协调、路线规划无法灵活变通等问题陷入停滞，其前景并不乐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巴以冲突后，阿拉伯国家公众舆论普遍支持巴勒斯坦，这阻碍以阿关系正常化，并推动阿拉伯国家反对以参与 IMEC。第二，IMEC 重要港口海法港以及连接阿拉伯半岛的基础设施未来恐受巴以冲突波及，加剧 IMEC 建设的安全风险。第三，IMEC 路线调整路线面临重重困难。总之，IMEC 缺乏“一带一路”灵活的应变能力，因此其既无法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关系，也很难抵御外部冲击。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0/is-the-india-middle-east-europe-economic-corridor-dead-on-arrival/>

编译：常家碧

10、《外交事务》：被地缘政治遗忘的土地

10月17日，《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刊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拉丁美洲研究院威尔·弗里曼(Will Freeman)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美洲项目主任兼委内瑞拉未来倡议负责人瑞安·伯格(Ryan C. Berg)的文章《被地缘政治遗忘的土地》。文章称，从乌克兰到中东的冲突和不稳定正在加剧，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而拉丁美洲远离地缘政治断层线，完全处于观望状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大多拉美国家试图与中美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边缘位置带来的积极的一面是，拉丁美洲逐渐远离国际关注，使得该地区比以往都不受外国干预。但拉丁美洲目前面临跨国组织犯罪、移民激增及毁灭性自然灾害等严峻挑战，这一边缘位置意味着拉丁美洲可能错失其迫切需要的经济机会和国外支持。为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利益，拉丁美洲应努力寻求改变这种边缘位置的机会。作者呼吁，应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同解决跨境挑战，如气候变化、供应链和绿色转型等，拉近和地缘政治中心的距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south-america/land-geopolitics-forgot>

编译：林幼玲

11、《国家利益》：美国必须阻止金砖国家成为地缘战略竞争对手

10月20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平伙伴关系基金董事会成员哈雷·利普曼(Harley Lippman)文章《金砖国家+去美元化:经济还是地缘政治问题?》。作者认为,最近扩容的金砖国家正探索着去美元化的潜在手段,这就需要成员国以当地货币向他国提供贷款以减少美元的交易数量,这也意味着金砖国家从最初的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为政治组织,并朝着拒绝西方国家主导世界规则的方向转变。作者的逻辑基础是:第一,金砖国家缺乏固定章程,也没有固定的秘书处,加入金砖国家的标准也很模糊,“任意成员资格”也说明吸纳新成员国时的政治考量。第二,其余金砖国家并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伊朗支持俄罗斯等行为,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强南南国家间政治联系。因此作者认为,美国需要防止金砖国家在中长期内成为地缘政治战略竞争对手,这就需要加强与新加入的国家的关系,以抵消金砖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作者希望金砖国家忠于最初使命,不要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不要站在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对立面。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rics-de-dollarization-economic-or-geopolitical-problem-207005>

编译:庞远平

12、《国家利益》:改变中东方针的时候到了

10月21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卡托研究所国防和

外交政策分析师乔恩·霍夫曼（Jon Hoffman）和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汀·洛根（Justin Logan）的联名文章《改变中东方针的时候到了》。文章指出，哈马斯的袭击应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其中东立场，而非继续奉行失败的政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给美国的中东政策带来了巨大打击，但一些支持者却将其归咎于美国脱离与中东的接触，表示美国应该继续深入中东来保障自身的利益，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源于地区秩序变化，与美国关联不大。但是，冲突使美国中东政策失去了信誉，损害了地区稳定和美国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访问中东期间，多次谈到中东未来的“两条道路”：一是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实现稳定与和平；二是当前哈马斯表现出的恐怖、破坏、虚无主义。最初美国希望《亚伯拉罕协议》能够推动建立能够稳定地区的正式联盟，但地区国家却利用该协定，使美国作为安全保障继续地区纠葛，通过大国间的相互博弈获取更大利益。协议非但没有为美国带来利益，反而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作者指出，美国应认识到过去政策的失败，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局限性，收缩中东政策，避免事态升级并危害自身。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ime-change-course-middle-east-207004>

编译：施畅

13、《外交政策聚焦》：普京关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10月20日，《外交政策聚焦》网站刊登了白俄罗斯记者、评论员塔蒂亚娜·伊万诺娃（Tatyana Ivanova）的文章《普京关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文章首先阐述了普京在本次巴以冲突中的立场，即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诉求，承认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普京认为以色列的方法是残酷的，并将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列宁格勒的围攻相类比。作者指出，普京进行此种表态的原因在于：第一，转移国际注意力，在战术上减轻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面临的舆论压力；第二，拉拢伊朗、支持哈马斯、打压美国，争取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打破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垄断，重建俄罗斯作为有效的中东冲突调解人的外交地位；第三，探寻其对乌克兰空袭合法化的途径，寻求其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作者指出，巴以冲突弥漫着美俄博弈的色彩，冲突不会仅限于美俄双方，其最亲密的盟友—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都将卷入冲突。

<https://fpif.org/putins-interests-in-the-hamas-attack-on-israel/>

编译：勾贺

14、欧洲政策中心：欧美需努力合作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10月20日，欧洲政策中心发布欧洲政治经济项目负责人格奥尔格·里克勒斯（Georg E. Riekeles）和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研究员弗朗西斯·布鲁维尔（Frances G. Burwell）撰写的评论文章《欧盟-美国峰会：迎来关注地缘政治的关键

时刻》。文章指出，欧美应在本次峰会上合作应对其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维护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经济安全。政治方面，首先，欧美需协调应对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推动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并确保必要的对乌武器和财政支持。其次，欧美需合作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同时警惕国内外网络安全风险。最后，欧美需基于共同价值加强盟伴合作并加速推动全球民主进程。经济方面，首先，欧美需加速关键原材料和可持续钢铝的谈判进程，应对来自中国等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挑战。其次，欧美需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与安全对话，加大人工智能投资与培训支持。再次，欧美需提升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转型承诺，增强跨大西洋气候政策开放性和标准公正性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最后，欧美需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和数字转型援助，以此保障跨大西洋经济安全和韧性。总体看，欧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对缓解跨大西洋紧张局势和建立双边共识至关重要，未来欧美需完善 TTC 机制框架并发展更广泛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https://www.epc.eu/en/Publications/The-EU-US-summit-Time-to-focus-on-geopolitics~54daa8>

编译：王一诺

15、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及其盟友应在人工智能法律政策方面与中国接触

10月19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登载了研究员马克·麦卡锡（Mark MacCarthy）的文章《美国及其盟友应在人工智能法律政策方面与中国接触》。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由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负责，它的一系列新规能够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许多启示。第一，CAC不偏袒现有大型企业，而是鼓励创新型初创企业，这不仅保证了许可制度的有效性，还有利于提高人工智能创新动力。第二，CAC规定人工智能许可仅向已经为公众提供了生成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发放，而不适用于从事研发或将其用于内部组织运营的公司，说明将创新和速度置于官僚程序之上。第三，CAC是单一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集中化管理更有利于控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第四，CAC要求生成型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训练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和多样性。第五，CAC规定人工智能公司在提供服务时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发现非法内容时，作为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的公司应立即采取措施解决。这些中国经验能够给美国和欧洲在AI非法内容归责、提高训练数据准确性等方面的辩论提供参考。文章同时指出，尽管中国愿意和国际社会开展人工智能合作，但因为拜登政府给中国贴上了数字独裁主义国家的标签，美国更加难以和中国监管机构接触并讨论具体的技术政策问题。11月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将会成为美欧与中国接触的第一个契机。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us-and-its-allies-should-engage-with-china-on-ai-law-and-policy/>

编译：马莹芝

16、《外交政策》：全球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胁

10月23日，《外交政策》期刊网站发布琳恩·奥唐纳（Lynne O'Donnell）撰写的文章《哈马斯发动袭击后，全球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胁》。文章指出，由于恐怖组织需要通过高调的恐怖袭击来吸引武器与人力，而哈马斯与塔利班的成功使得当前遍布全球的恐怖组织热情高涨，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在几周内持续加剧。目前，哈马斯获得伊朗与卡塔尔的资金与军事支持，这有助于哈马斯维持其在加沙地带的现状。与此如此，其他恐怖组织开始策划恐怖袭击，从而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哈马斯袭击事件可能预示着世界各地激进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极端恐怖组织在欧洲的出现为全球所有安全和情报部门敲响警钟。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0/23/israel-hamas-war-terrorism-attack-intelligence-afghanistan-taliban/>

编译：李成琛

编译：林幼玲、常家碧、李达镐、雷文聪、李佳骏、刘楠、
何秉轩、黄辉平、张瑞勇、马子涵、庞远平、施畅、勾贺、
王一诺、马莹芝、李成琛

审核：苗争鸣、周武华、姚锦祥、苏艳婷、文晶、许馨匀